

日本特高课述论^{*}

米彦军

内容提要 二战时的日本宪兵队特高课和内务省特高课都是日本天皇制政府的忠实鹰犬,前者负责日本外事和日军思想工作,在中国、朝鲜、东南亚各地破坏抗日组织和共产党等进步组织,不择手段地搜集军事、政治、经济情报,双手沾满了亚洲各国人民的鲜血,给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人民带来极大危害。后者主要负责日本国内事务,残酷镇压社会主义运动和民主主义运动,强制日本国民无条件服从日本天皇制军国主义侵略政策。二战后,前者大部分被处决,后者虽一度被解除公职,但随着美国对日政策的转变,摇身一变成为国会议员和政要。其后人在政界、财界和地方担任要职,继承和发展了他们扭曲的历史观,为日本军队和宪兵特高课翻案,是当今日本右翼思潮的根源之一。

关键词 内务省特高课 宪兵队特高课 沦陷区特高课 反动思潮

虽然二战时期纳粹德国的秘密警察盖世太保,无人不晓,但在日本亦出现过地位、作用相当于盖世太保的反动组织特高警察就鲜为人知了。他们在日本国内鼓吹法西斯思想,残酷镇压进步分子,取缔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将日本民族引向侵略战争歧途,在占领区破坏各种抗日组织,不择手段地搜集军事、政治、经济情报,双手沾满了亚洲各国人民的鲜血。二战后不久,特高警察曾一度被解除公职,但随着美国对日政策的转变,摇身一变成为国会议员和政要,在地方上的势力亦是根深蒂固。这一反动组织的绝大多数人虽已作古,但其后人依然在政界、财界和地方掌握要职,继承和发展了他们扭曲的历史观,是当日本右翼思潮的根源之一。但是,中外学者或只研究特高警察在日本国内的活动,或仅提到该组织在中国沦陷区的活动,至今未见全面阐述该组织在日本本土和沦陷区活动全貌的研究成果。

其实,特高课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特高警察是指归内务省管辖,镇压日本国内的反体制言论、思想、宗教、社会运动的秘密警察。广义的则包括归内务省管辖的特高课、日本国内归军部管辖的宪兵队特高课、中国沦陷区的特高课等。本文的研究对象,是广义上的特高课,重在阐述内务省特高课、归军部管辖的宪兵队特高课、中国沦陷区特高课,以及三者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及其对战后日本社会思潮的影响等,以期深化和扩展日本特高警察史研究。

一 内务省特高课

(一)特高课的设立过程及目的。

特高课也称特别高等警察,从1911年的大逆事件开始到二战后废除为止,是负责处置反体制

* 山西大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阶段性成果之一,批准号:0709097。

言论、思想、宗教、社会运动的秘密组织。1874年,日本发生了自由民权运动。该运动的积极分子通过递交请愿书、建议书向明治政府提出开设议会,减免地租,修改不平等条约及保障言论与集会自由等一系列要求,一些地方甚至发展为暴动。为镇压自由民权运动,日本政府设立了“国事警察”。1889年“明治宪法”颁布后,将“国事警察”改称“高等警察”。1900年,日本政府颁布实施《治安警察法》。1911年8月,警视厅设立了以取缔社会运动、政治运动为目的的特别高等警察课,并从高等警察独立出来^①,特高警察这一组织正式形成,通常称之为特高课。之后,特高课逐渐在日本各地建立组织,特别是1922年日本共产党成立后,翌年便在大阪府、京都府等9个主要府县的警察部设立了特高课。三一五事件后,日本政府以“对赤化实行恐怖”为由在全国府县设立特高课,还在主要警察局设置特别高等组长,建成了全国性组织,各地遍布监视网和密告网,甚至澡堂内的议论也能传到他们耳朵里。警视厅的特别高等警察课,升格为特别高等警察部后,组织结构更趋于完善。

设立特高课目的在于维护日本国体。1935年8月3日和10月15日,日本政府分两次发表的《国体明征声明》解释说:“我国体在天孙降临之际下赐的神敕中说得明明白白,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国家,宝祚与天地同在,公布宪法的上谕中说朕从祖宗那里继承国家统治大权,并传之子孙,宪法第一条明示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这才是我国体的本义,是帝国臣民不可动摇的信念,政教其他百般事项都要以此为根本。认为统治权不在天皇,而在国家,天皇只不过是行使统治权的机构就是对万国无比的我国体本义的歪曲。”^②德富苏峰等右翼思想家全面改造了儒家思想的忠孝观念,炮制了皇室是日本国民的祖先,对天皇尽忠,也就是对父母尽孝的忠孝一致理念。日本政府在颁布的《教育敕语》中,要求臣民忠君爱国,认真学习西方技术,国家一旦发生战事,应为天皇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日本之所以产生这样的国体,是因为明治维新前的日本社会还没有发展到法国大革命前的那样的阶段,明治维新是由资产阶级化了的武士集团借助精神权威天皇自上而下进行的极不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本着“和魂洋才”的原则,物质层面完全西化,而在政治制度等精神层面,只是表面西化,日本明治宪法不过是披了民主外衣的君主专制宪法。因此,其国体表现出以下3个特征。

其一,这一国体反映的是以天皇为首的一小撮大地主和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天皇是日本最大的地主,而且拥有大量矿山工厂,还有三菱等大财阀的股票,也是日本最大的资本家。因此这一国体主张主权在天皇,要求国民忠君爱国,否认主权在民和天赋人权等民主理念。

其二,二战前的日本实行天皇制专制,虽然排斥民主,但也是资本主义国家。主张公有制,否定天皇制的日本国内社会主义运动和当时的共产国际,对日本来说是巨大的威胁。民主运动虽也反对天皇专制,但在主张私有制和天皇制上与日本政府有共性,因此,日本政府在不威胁其国体的情况下,通过扩大选举权来拉拢和瓦解民主势力。

其三,日本国内资源匮乏,为侵略中国等亚洲国家,形成了所谓的“举国一致”态势。1936年二二六事变后,日本由天皇制一步步走上天皇制法西斯主义道路,在国内镇压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在国际上不仅敌视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而且和德意法西斯结成轴心国同盟,试图重新瓜分世界。侵外必先安内,如果不将国内民主运动、社会主义运动扑灭,不仅不能放手侵略外国,甚至连专制政权都保不住,而且从事社会主义运动和民主主义运动的相当部分人士又是反战的。因此,日本政府

① [日]柳河濑精:《特高官僚——战后反动潮流的源泉》东京:日本机关报出版中心2005年版,第8页。

② 《国体明徴ニ関スル再声明ヲ通牒ス》,《国立公文書館公文類聚・第五十九編・昭和十年・第二卷・政綱二・地方自治二・台湾・統計調査・雜載》,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レファレンスコード:A01200686500

设立了特高课这一暴力组织,专司“安内”。

(二)特高课的组织结构和本质。

特高课归内务省管辖,是内务省的核心机构。内务大臣下设警保局,主管国内、殖民地(包括台湾、朝鲜)的警察。警保局下设保安课,该课下设警视厅特高课(又称特高部)及北海道、大阪府、京都府和各县警察部特高课。地方上的特高课被置于内务省警保局保安课长的直接管辖之下,不受府县知事等地方长官、警察部长的管辖或干涉。警视厅特高课设有特高一课、特高二课、工运课、外事课、调停课、审阅课、内鲜课(日本国内和朝鲜)。特高二课专门负责防谍和从事间谍活动;工运课和调停课负责镇压和瓦解社会主义运动;审阅课和图书课联手检阅各类印刷品,取缔各种反战思想和反天皇制思想;内鲜课主要负责朝鲜的特高课。最初,特高课是一个应付国内事变的机构,但因日本侵略中国等亚洲国家的需要,日本政府逐渐转变特高课的职能^①,在伪满的哈尔滨等日军占领的中国各地“日本领事馆警察署”内设有特高课,使其以日本驻外使领馆官员身份,在收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等情报的同时,配合其他间谍情报机构进行谍报活动。^②

内务警察官僚机构与其他省厅不同,自成一派,不受议会辖制,拥有替代法律的紧急勅令权和警察命令权,是可以自由扩展权限和机构。警保局长是敕任官,即天皇的心腹,如此特高课就直接掌握在皇室手中。

由此可见,特高课的本质是天皇制政府的政治思想警察及忠实鹰犬,并为日本法西斯侵略战争服务,间接或直接地对亚洲特别是中国的抗日战争事业造成了巨大危害。

(三)内务省特高课的罪恶行径及其危害。

特高课依据《治安警察法》和 1925 年 4 月 22 日公布的《治安维持法》从 1920 至 1945 年,对日本共产党、部分激进的社会民主主义者、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部分宗教团体等进行了残酷镇压。具体分为以下几个阶段:1920 至 1925 年,主要对一战结束前后蓬勃发展的工会团体、幸德秋水事件后暂时跌入低谷继而又发展起来的社会主义运动、反天皇制运动进行镇压;1926 至 1932 年,利用《治安维持法》对接近共产党的合法大众团体进行镇压;1933 至 1936 年,镇压对象扩大到自由主义者的合法言论;1937 至 1940 年,对非共产主义的社会民主主义和民间文化团体《世界文化》等进行镇压;1940 至 1945 年,利用企画院事件、满铁调查部事件,清除在战时体制内尝试改良政策者。现将特高课典型的罪恶行径列表如下。

内务省特高课罪恶行径简表

时间	事件名称及概要 ^③
1920 年 1 月 10 日	东京帝国大学经济系森戸辰男教授因违反报纸法被判刑。
1921 年 5 月 9 日	日本社会主义同盟被禁止结社,出口王仁三郎等人因大不敬罪、违反报纸法罪被起诉。
1923 年 6 月 9 日	社会主义者高尾平兵卫被枪杀。
1925 年 12 月 1 日	农工党成立当天即被禁止。
1928 年	在三一五事件中,起诉了 483 名社会主义者。
1928 年 4 月 18 日	京都帝国大学经济系教授河上肇被开除。

① bake.baidu.com/view/1043668.htm 29K 2008-11-25

② [日]柳河濑精:《特高官僚——战后反动潮流的源泉》东京:日本机关报出版中心 2005 年版,第 19 页。

③ 来源:フリー百科事典『ウィキペディア(Wikipedia)』, <http://ja.wikipedia.org>

1928年 10月 6日	日共书记渡边政之辅,在台湾基隆被警察追得走投无路自杀。
1929年	在四一六事件中,日共以及相关者 339人被起诉。
1929年 3月 5日	暗杀了反对治安维持法修改事后承认案的山本宣治议员。
1930年	在同情日本共产党事件中,中野重治、三木清等人被起诉。
1932年 4—11月	镇压无产阶级文化团体,宫本百合子被传讯,日共中央委员岩田道义被残杀。
1933年 2月 20日	小林多喜二被传讯,在警视厅筑地警察署被残杀。
1934年 5月 2日	修改出版法,加强了对冒渎皇室尊严、破坏安全秩序的处罚。
1935年 2月 18日	在天皇机关说事件中,美浓部达吉被迫辞职,著作被定为禁书。
1935年	特高课官僚田中樗一指指挥镇压鹿儿岛佃农运动。
1936年 5月 28日	《思想反保护观察法》公布。
1936年 11月 29日	新兴佛教青年同盟的妹尾义郎被传讯。
1937年 12月 22日	禁止日本无产阶级以及日本工会全国评议会结社。
1938年 11月 29日	指控冈邦雄、户坂润等人组成的唯物论研究会有“赤匪”倾向,35人被传讯,户坂死于狱中。
1940年 1月 11日	津田左右吉的《神代史研究》被定为禁书。
1941年 12月 19日	公布《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临时取缔法》。
1942年 6月 29日	侦破中西功等上海反战组织。
1943年 3月 13日	公布《战时刑事特别法》。
1945年 2月	因战败的“流言蜚语”遍布东京市井街头,40多人被起诉。

上表所列只不过是内务省特高课罪恶行径的沧海一粟。据政府统计,特高课逮捕 75681人,而实际被捕人数估计达十几万人,被判刑者有 5126人^①,其中很多是无辜者。特高课本性凶残,采用令人发指的残忍手段折磨嫌疑人。如用棍棒、竹刀殴打,用锥子扎大腿、用烙铁酷刑、浇冷水、用胶管向鼻孔注水或者倒吊,凌辱女嫌疑人也是家常便饭。作家小林多喜二被捕当天就在警察局遇害。西田信春被捕后消息中断,但在九州大学医学系解剖学教室发现了其遗体。

内务省特高课实行白色恐怖,钳制人民思想。日本国内的社会主义、自由主义等各种进步势力、反战势力被残酷镇压,唯有法西斯主义官方意识形态得到宣传,并给大多数日本人民“洗脑”,形成举国一致态势,使他们无条件遵奉上级的意愿,充当侵略战争的炮灰。

昭和天皇大加褒奖这些刽子手们。1936年 11月 27日,为庆祝“日德防共协定”签订,内务大臣上奏天皇称:“特高课夜以继日地清剿日本共产党,为维持国家治安立了功。”^②昭和天皇遂授予镇压日本共产党的纈纈弥三、毛利基、浦川秀吉、山県为三等警视厅特高课主要成员,友部泉三、安倍源基、富田健治等警保局保安课长、警视厅特高课长,中川成夫、榎本三郎、须田勇等警视厅第一线的特高警察官,以及在北海道、大阪等地进行镇压工作的特高警察官等 48人勋章和奖杯。

(四)二战后特高课借尸还魂。

二战后,对内务省特高课的处理以冷战爆发为界,前后发生了很大变化。1946年元旦,昭和天

① [日]柳河濑精:《特高官僚——战后反动潮流的源泉》第 10页。

② 《小林多喜二らを虐殺した特高じ動章本当ですか》,《赤旗新聞》2006年 8月 17日。

皇发布了《人格宣言》，把自己由神格降为凡人，否定战前天皇主权国体，规定主权在民，日本永远放弃战争。1945年10月，日本政府在以美国为首的盟国占领当局授意下，认定内务省特高课人员是战争推进者、合作者，是战犯，因而褫夺其公职，特高课这一机构和《治安维持法》一起被废除，内务官僚、特高课警察约5000名被肃清，但就其进行的任意逮捕、冤狱、拷打、虐待、凌辱等反人道罪没有采取任何处罚和清算措施^①；释放战时被特高课逮捕的政治犯、思想犯3000多人，给被错判者发出书面通知说：“可认为该判决不存在”，抹去记录在户籍簿上的“犯罪指控”事项。但是，至今未公开向日本国内、外受害者道歉，也未给予任何补偿。^②

冷战开始后，世界分裂为东西两大阵营，美国在国内掀起“麦卡锡”反共浪潮，由于新中国加入苏联社会主义阵营，美国不再把日本视为敌国。1952年4月，在苏联等国缺席情况下，美国主导在旧金山签订片面的对日和约，扶植战前旧官僚上台执政，将日本作为反华、反苏的桥头堡。日本共产党、民主团体等纷纷发起游行示威，反对片面媾和。日本国会通过了吉田茂内阁提出的类似战前治安维持法的《破坏活动防止法》，在原特高课基础上成立公安调查厅。美国占领当局很赏识战前特高课镇压日本共产党、民主人士的手腕，重新起用他们为公安调查厅负责人，让他们充当肃清日共和进步人士的急先锋。

不仅如此，战前特高课官僚们的势力在中央和地方根深蒂固，许多人仍然担任皇宫警卫、警视厅、日本育英会、文部省、旧自治省、防卫厅、厚生省、劳动省、恩给局、人事院、政府附属机构、各种委员会的要职，在地方上也继续担任县知事、副知事、市长、助理、教委主任等要职。如原特高课官僚田中樞一任大阪副知事。他们还竞选国会议员，进而爬到中央高层。

他们调查教师言行，美化侵略战争，否定教委公选制，推动国家对教材、教育内容进行统制。前述中川成夫战后曾任东京北区教育委员长，高山岩男战后任文部省初等教育局长期间通过了扶桑社出版的美化侵略战争的《新历史教科书》。山崎岩当选国会议员并兼任宪法调查会会长，鼓吹修改和平宪法，使日本成为能对外行使武力的“普通国家”；鼓动制定靖国神社法案，妄图使政治家参拜靖国神社合法化。甲级战犯嫌疑犯安倍源基获释后，在幕后左右着自民党政权。原鹿儿岛县特高课长奥野诚亮任法务大臣时明确提出“推进宪法修改”。从1964年秋开始，原特高课官僚们因镇压民主教育“有功”相继受勋。如，原警视厅特高课长纈纈曾获二等瑞宝章。

由于日本政治家世袭现象普遍，前内务省特高官僚的后代也继承了他们的政治地盘，继续把持政权。如曾任内务官僚的原首相中曾根康弘的儿子曾任外务大臣，原外务大臣町村孝信的父亲町村金五就是原内务省管理特高课的官僚。肯定侵略战争和否定特高课罪行是一个铜板的两面，战后原特高课官僚猖獗活动目的是遮掩战前的各种罪恶。这是当今日本反动思潮此起彼伏和中日关系时好时坏的原因之一。

二 陆军省宪兵队特高课

（一）陆军省宪兵队特高课的组织机构和职责。

如果说地方上由一般警察维持治安，由特高课负责监视人们思想，那么，日本军队中的警察就是宪兵，隶属于陆军省，职责是接受陆军大臣命令，处罚包括陆军及海军中违反军规者，另外在普通警察管辖之外的边境地区和日军占领区作为武装警察担负着维持治安的职责。日本军部非常惧怕

① [日]柳河濑精：《特高官僚——战后反动潮流的源泉》第10页。

② [日]柳河濑精：《特高官僚——战后反动潮流的源泉》第9—10页。

军队中共产主义思想的传播会引起哗变,看到内务省特高课在钳制人们思想上“卓有成效”,于1928年7月4日,在日本宪兵中设置了特务机构——特高课。日本各地都设有宪兵队,宪兵队长挂大佐军衔,下属特高课长的军衔是中佐或少佐。宪兵队内设有特高一课,又称政治班,负责政治思想教育;特高二课又称警务班,负责陆军、海军大员的安全工作;特高三课是外事课,负责谍报,分为甲、乙、丙、丁、戊班。甲班负责监视国内外要人、外国公使馆和大使馆;乙班负责窃听国内外电信、电话和截获无线电通信;丙班负责国内外邮件的开封、海关行李检查;丁班负责窃取或夺取需要监视者的行李;戊班负责暗杀国外间谍和间谍破侦。

(二)向军人灌输《军人敕语》监控日本国内军民思想。

军队是天皇制政府维持国内统治和对外扩张的重要工具,以天皇为首的日本统治者和军部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他们除了订立各种严格的军纪外,也进行思想教育,意在使军队效忠天皇。1882年明治天皇颁布《军人敕语》的主要内容是“我国军队世代代天皇所统率,此乃日本的国体。朕是尔等军人的大元帅,与尔等一心相连,荣辱与共,朕赖尔等为股肱,尔等仰朕为头首,其亲特深。军人对朕须忠节、礼仪、武勇、信义、质朴、诚心。此乃天地之公道、人伦之常经”。这与前述教育国民忠君爱国的《教育敕语》在内容上有相通之处。二者是对《明治宪法》的必要补充和阐释,都强调了“国家主权归属天皇”这一国体,天皇集行政、司法、立法、军权于一身。但是,明治维新以后,军队改为征兵制,大部分兵源来自穷苦的农民和工人。随着日本社会主义运动、民主主义运动的蓬勃发展,很多士兵对等级森严的军内黑暗非常不满。对此,军部感到莫大的威胁,于是,命宪兵队特高一课担负起军内取缔社会主义、民主主义思想的任务。

二战期间,因为宪兵队特高课在人员和武器配备上比内务省特高课更有优势,且掌管司法警察权,故也与一般警察一样可以对日本国民使用《治安警察法》和《治安维持法》,逐渐拥有取缔反战思想、镇压国民激进思想的权限。随着战事吃紧,宪兵队特高课不仅对国内军人,也对国内市民加强了思想控制,与内务省特高课一起残酷镇压社会主义者、民主主义者和反战人士,其虽与内务省特高课容易混淆,但两者确实像别动队化身一样互相配合、各司其责。特高宪兵虽是军人,但可以像内务省特高一样着便装行动,其任务是揭发和镇压政党、工会、驻日朝鲜人团体等“不稳”组织。所谓“不稳”组织是指“右翼”和“左翼”,当右翼和军部勾结之后,宪兵特高课不再过问右翼活动,专门镇压左翼活动。^①而且,宪兵特高课在帝国议会开会期间,经常赶到会场,监督议员发言。

(三)陆军省特高课的谍报活动。

陆军省宪兵队特高课运用窃听技术和无线电侦察车等先进设备,在日本国内侦破了多起间谍案。如,著名的佐尔格苏联间谍案,就是由日本宪兵队特高课联合内务省特高课侦破的。理查德·佐尔格(1895年10月—1944年11月)是苏联侦察员、新闻记者和著名英雄。他于1914年在德国应征入伍,参加一战,1919年加入德国共产党。1924年,他来到苏联,被苏军侦察机关录用,长期为苏联提供有价值的情报:苏联卫国战争前夕和初期,他在日本创建的反法西斯国际主义者组织,为苏联统帅部提供了有关德军侵略计划和日本军国主义者在远东的企图等重要情报。1941年10月18日,佐尔格在日本被捕。1944年9月29日,他宁死不屈,被处以绞刑。

通常认为,为逮捕佐尔格铺平道路的是警视厅特高第一课的宫下弘副警部。宫下弘当时在目黑警察署审讯日本共产党干部伊藤绿时,从其口中得知从美国回国的北林友是佐尔格的合作者,北林友供出了画家宫城与德,之后顺藤摸瓜抓住了尾崎秀实和佐尔格。但是,最新研究发现,逮捕佐尔格并非因为宫城与德和尾崎秀实的招供,而是宪兵队“山”机关乙班的移动监视队首先发现了佐

① [日]岡部俊雄:《「宪兵」と「特高警察」》,《生活者通信メルマガ版》,第38卷,第21—40页。

尔格的藏身之处,并通过三点定位法找出了电波信号源头是东京广尾町。这一情报立即报告给东京宪兵队特高第一课,特高第一课立即通知警视厅特高第一课和外事课。接着,警视厅逮捕了佐尔格。“山”机关的移动监视队之所以在成立不到4个月,就找到了佐尔格等人的藏身之处,主要是凭借其高精度的防间谍器材和监视队员的机警。

随着东京宪兵司令部直属部队率先成立无线电反间谍班,之后逐渐扩展到日本各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除东京外,还在横滨、神户、门司、汉城的各地宪兵队设立了窃听班。可以说,二战时期日军的谍报网络遍及日本本土及其所有殖民地和占领区域。

三 中国沦陷区的日本特高课

(一) 中国沦陷区特高课的设立目的和组织结构。

九一八事变后,随着中国大陆抗日活动的蓬勃发展和日本侵略中国的现实需要,陆军省宪兵队特高课人员为从事谍报活动,前往日占区。1931年10月驻华“日本领事馆警察署”内开始设立特高课,其多数成员是日本内务省特高课以驻华武官名义,派出收集共产国际和中国抗日活动信息的情报者。同时,在中国沦陷区内还建立了归各野战司令部管辖的宪兵队。日本本土宪兵的主要职责是充当军事警察,而中国沦陷区宪兵的主要职责是既维持治安又充当军事警察。这是因为在沦陷区,普通警察无法完成维持治安的任务,所以赋予宪兵普通警察的职责,并进而在各宪兵队设立特高课,管辖各地伪警察署内设立的特高课。

沦陷区日本宪兵队特高课及其下属的伪警察署内的特高课,在日本本土派来的内务省特高课和陆军省宪兵队特高课的配合下,负责中国沦陷区的侵华特务活动和谍报活动。具体说来,有5项目的:第1项是宣传安抚、监视中国人的思想动态,取缔反日言行;第2项是搜集情报,汇编情报资料;第3项是破坏地下抗日组织,侦捕审讯处理特工人员,即所谓的“平叛”等;第4项是监视伪高官言行;第5项是进行策反、诱降等活动。

由于日本政府把中国东北当作反苏和扩大侵华战争的基地,故其特高课组织主要集中在中国东北。1934年,关东军宪兵司令官东条英机开始扩建宪兵队,并在其内部设立特高课,此后逐渐将伪满警察署的各特高课改编为其支部,下辖延吉支部、珲春支部、黑河支部、热河支部、通化支部、佳木斯支部、兴安支部、东安支部、海拉尔支部、满洲里支部、三河支部、丰原支部、奉天支部、大连支部、牡丹江支部、绥芬河支部、齐齐哈尔支部等。除此之外,在华北、内蒙古、上海、江苏、台湾等地,亦遍设宪兵特高课组织。

(二) 中国沦陷区日本特高课的罪恶行径。

首先,宪兵队特高课在中国东北地区活动最为猖獗。以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为首的日本特高课,网罗特高第二课的川岛芳子(中文名字金璧辉)、南造云子等高级间谍,利用沈阳和哈尔滨的妓院为掩护搜集情报,并以各种手段控制其属下的中国和白俄情报人员。他们曾密谋了向中国东北移居流亡犹太人的“河豚计划”^①,以加强日本对满洲的统治,最后由于种种原因没能成功。

非常重视防谍工作的关东军宪兵队,于1941年3月在长春成立了科学反间谍队,通称八六部队。还有一些特高课成员以原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职员的身份,搜集中国东北各地的中央机关各

^① 1934年,日本首次提出一份欲将受纳粹迫害的犹太难民安置在日本控制的亚洲大陆地区,并为其所用的计划。但是,日本在加入三国轴心集团后,为避免得罪纳粹德国,暂时搁置了该计划。之所以称河豚计划,是因为安置犹太人符合日本国家利益,同时也伴随着危险,即类似于河豚味道甚佳,但烹饪不当会导致中毒身亡的意味。

部局、地方机关、附属机关、商工会议所、银行、公司、交易所、协会的资料,领域涵盖行政、财政、信息、人口、金融、贸易、各产业、市场、教育、文化、生活、劳动、地理、土木、铁道、通信等,甚至将辽河水泛滥期、枯水期、结冰化冰期都记载得一清二楚,资料翔实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为后来大举入侵和移民中国东北作好了准备。^①

九一八事变后,关东宪兵队特高课除配合关东军进行军事围剿中国抗日力量之外,在平时亦指挥其他镇压机构和人员,在中国东北实施实行白色恐怖。1936年6月,日本关东宪兵队下达命令,对有抗日倾向的北满新闻界、教育界、共产党地下组织进行了一次有预谋、有计划的大规模逮捕和镇压。时任关东宪兵队司令部特高课“思想对策”主任兼警务部第三课长的宇津木孟雄,起草制定了侦察计划、命令方案和《以哈尔滨为中心的一齐检举共产党计划一览表》,并进行了周密部署。从6月13日开始,日伪警宪特在齐齐哈尔、哈尔滨、海拉尔、牡丹江等地,同时实行大逮捕,仅第一批抓捕人数就达149人。其中,哈尔滨52人,齐齐哈尔38人,海拉尔11人、牡丹江48人;此后,他们继续在各地实施抓捕,总人数达213人^②,其中大多是教育界、报界的爱国人士,并对被捕者酷刑逼供,多人被迫害致死。

1937年4月15日,宪兵队特高课制造了四一五事件,对北满哈尔滨、南满奉天、抚顺等地的中共地下组织,又一次实施了大规模逮捕和镇压,并残害了一大批无辜群众。他们在哈尔滨逮捕了中共哈特委书记韩守魁等110人,在安达、双城、阿城等地也抓捕了数十人,接着又将逮捕扩大到奉天、大连等地。至11月,共有党员、团员及爱国群众745人被捕入狱,其中198人被杀害。^③中共哈东特委、哈尔滨市委、奉天市委、大连市委,以及海伦、呼兰、抚顺等地县委、特支遭到严重破坏。

1938年3月,日本宪兵队特高课又制造了三一五惨案。七七事变后,抗联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国会在三江地区十分活跃,给日伪以沉重打击。佳木斯日本宪兵队特高课和伪满警察署特高课联合实施大逮捕计划^④,共逮捕了党员、抗联人员、干部、群众387人^⑤,中共基层组织受到严重破坏。日伪统治者对被捕的地下党员和爱国群众,在进行酷刑审讯之后,判处高雨春等18人死刑,另有92人分别被判处无期或有期徒刑。

1943年7月,日本侵略者为了加紧搜集苏联、蒙古及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诸方面的情报,镇压中国人民日益增长的抗日情绪,成立了伪满洲国第九宪兵团,并在宪兵团内增设了搜集情报、了解民心情况、镇压人民反抗的专职机构——特高课,以使蒙、汉及各族人民群众随时随地都处在他们的监视之下。

其次,宪兵队特高课在华北地区活动频繁,为非作歹。在土肥原贤二和川岛芳子等人的策划下,日本特务机关试图拉拢阎锡山、韩复榘、宋哲元等中国地方实力派,企图使他们脱离国民政府,另立自治政权,但没有收到成效。1935年5月,4名日本军人在察哈尔省由多伦经张北县沿途偷绘地图,到达张北时因无证件而被中国军队扣留。土肥原立即以此为由向冀察当局施加压力,逼迫察哈尔省民政厅厅长秦德纯与之签订《秦土协定》。1935年10月,土肥原特务机关进入北京后,煽动殷汝耕于11月25日在通县宣告脱离国民政府,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并发表了亲日宣言。七七事变后,侵华日军在内蒙古德王的配合下,挥军鄂尔多斯,以实施东条英机征服内蒙古的大魄计划。充当这一计划马前卒的日本陆军宪兵队特高课间谍频繁活动,欲通过暗杀有进步思想的沙

① 米彦军:《日本藏中国方志及研究综述》,《中国地方志》2005年第7期,第56页。

② 黑龙江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黑龙江文史资料》(28),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4页。

③ 王秉忠、孙继英主编:《东北沦陷十四年大事编年》,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28页。

④ 黑龙江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黑龙江党史资料》(9),内部发行2005年印,第155页。

⑤ 黑龙江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日伪暴行》,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46页。

王,削弱和瓦解反日力量,为日本军事进攻做好铺垫,但以失败告终。

最后,日本宪兵队特高课在中国其他沦陷区的野蛮行径。曾被日本侵略者誉为“帝国之花”的间谍南造云子,在上海的日特机关任特一课课长,经常出入英、法租界,逮捕了大批共产党员和抗日志士;还摧毁了国民党军统留下的一些联络点,诱捕了几十名军统特务,迫使他们成为日伪的汉奸走狗;并使得国民党在江中沉船,堵塞航道,再利用海军舰艇和两岸炮火,将长江航路截断的江阴要塞计划破产。1943年2月,日军在上海的特高课总部梅机关、汪伪特务组织76号、驻上海日本宪兵队联手对潜伏在上海的军统特工和中共地下组织发动突然袭击,在一夜之间几乎全部摧毁了国民党和中共的上海地下党组织。1940年后国际局势风云突变,台湾社会人心浮动,特高课从1941年8月至1945年4月,大肆逮捕台湾抗日分子,据统计经起诉者就有200多人。^①特高课还为日军偷袭珍珠港,在太平洋战线上与美军作战,提供了极为重要的情报。

(三) 沦陷区特高课的危害及其下场。

如上所述,日本宪兵队特高课在殖民地和沦陷区,策反民族败类,瓦解中国人民的抗日斗志,助长侵略者的气焰,维持沦陷区的统治,窃取中国军队重要情报,残酷镇压和破坏地下党组织和抗日组织,对一般百姓实行白色恐怖,给中国的抗日战争造成了重大损失,是世界反法西斯人民的公敌。他们甚至比战场上的日军危害更大,更可怕。

二战结束后,中国沦陷区的宪兵特高课机构和日本本土的宪兵特高课机构纷纷解散,特高人员亦是作鸟兽散。1948年11月,土肥原贤二以“破坏和平”、“违反战争法规惯例及反人道”等罪行,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为甲级战犯,在巢鸭监狱执行绞刑。川岛芳子也于1945年11月11日被中国反间谍机关逮捕,1948年3月25日被处决。南造云子早在1942年4月某晚,在上海法租界霞飞路(今淮海中路)被3名军统特工射杀。这朵“帝国之花”得到了应有的下场。日本乙、丙级战犯中,被判绞刑和枪决的约有1000名,其中300人是宪兵和宪兵特高课成员。但是,随着美国转变对日政策和战后日本经济腾飞,再度得势的日本保守派,竟于1969年4月在靖国神社内建造了“宪兵碑”。

结 语

以上对内务省特高课、陆军省宪兵队特高课、中国沦陷区日本宪兵队特高课的设立目的、背景、组织结构、罪恶行径、社会危害和特高课的下场等进行了论述。三者虽然职责各异,但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都是为维护天皇专制国体和日本对外侵略战争服务的忠实鹰犬。日本本土和沦陷区的宪兵队特高课成员,多数在二战后作为战犯受到惩处,就算没有被处死,也只能作为复员军人苟延残喘余生。

然而,内务省特高课官僚们却重新回到政权中枢,即使在地方上其势力亦是根深蒂固。他们不仅为被处决的或者被判刑的宪兵队特高课同行翻案,而且他们还是历史教科书问题、篡改和平宪法和教育基本法、强制天皇崇拜、叫嚣恢复军备和征兵制、要求恢复教育敕语式的“修身”教育、恢复国定教科书制度等反动言行的始作俑者。日本虽然标榜是民主国家,但各种职业和官位世袭现象严重。当特高课官僚死后,其子嗣通过继承其父选票地盘,当选议员,进入内阁,继续掌权。因此,尽管日本政府屡次重申日本所进行的侵略战争给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各国带来了重大灾难这一村山谈话精神,但是,严重伤害亚洲各国人民感情的行为,如美化侵略战争的“失言”和首相、阁僚参拜靖国神社的恶行仍不绝于后。一些别有用心之右翼学者更是著书立说,以歪理邪说为这些政客

^① [日]铃木敬夫:《民地下臺灣の弾圧と抵抗》,《札幌学院法学》,第21卷第1号,第243页。

们提供“理论”支持,致使反动思潮甚嚣尘上。

内务省特高课官僚,其实和纳粹德国的秘密警察盖世太保在本质上是一样的,但绝大多数盖世太保在战时和战后不久就被盟军逮捕或处死,幸运逃脱者基本上已经老死、病死,而内务省特高课官僚不仅没有丧命还掌握了政权。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盖世太保镇压国内进步势力的同时又残害国外进步人士,因此成为世界人民的公敌。而日本的盖世太保则由内务省特高课、陆军省宪兵队特高课和沦陷区宪兵队特高课三者组成,后两者恶贯满盈,为世人瞩目,而内务省特高课因为镇压的是日本人民,没有引起世界公愤。

其次,德国是被英法美苏四国占领,纳粹及其党羽盖世太保得到彻底清算,其政策、意识形态被彻底否定。战后初期,以美国为首的盟国虽也曾打算按照处理德国的模式处理日本,但冷战开始后,美国为对付苏联和中国,改变了初期的占领政策。其从自身利益考虑,不可能让日本共产党和社会党执政,那么既有执政经验又持反共立场的只有内务省的原班人马,而内务省的核心——特高课官僚更是可以利用的对象。

再次,日本国内批判特高课官僚者甚少。日本国内有一个“治安维持法牺牲者国家赔偿要求同盟”组织,长期以来对原特高官僚口诛笔伐,要求国家对战争期间的日本国内受害者进行赔偿。该组织收集受害者证词,收录在《抵抗的人们》(白石书店 1976年版)和“赤旗”社会部编撰的《证词特高警察》(新日本出版社 1981年版)两书中,但这种势力太单薄,声音很微弱。其实,战后特高官僚们之所以能够为所欲为,除了美国的支持外,还因为日本国民在选举中投了他们的票,才能当选议员,跻身政界。日本国民选举他们,一方面是因为日本政府对二战史教育重视不够,战后出生者不清楚这段历史,因此人云亦云地投票;另一方面,是因为把儿子、丈夫送上战场的日本国民基于羞耻心,不愿承认亲人在中国等亚洲各地所犯下的罪恶,而违心地认为那是为了“圣战”。基于此,日本国民即便受过特高警察迫害者也在忍气吞声,甚至违心地投票选择了那些昔日的特高官僚们。

最后,美国主导下的战后日本改革,虽然否定了天皇主权,但保留了天皇,成为战后重新掌权的特高课官僚们为自己开脱罪责的重要“借口”。美国保留天皇的目的,是通过天皇发号施令,减少美军占领日本期间的损失。战前天皇虽然总揽大权,但因为能力问题和惧怕承担责任,一般采取统而不治的方式,成功了是自己的成果,不成功则把责任推给臣下,以此来推托战争责任。但是,内务省特高课高官都是天皇亲自任命的,陆军省宪兵队特高课、沦陷区特高课亦都是天皇心腹。特高官僚们认为既然天皇没有罪,那么,他们也没有罪,侵略战争也没有罪,因而他们刻意美化侵略战争。

与今天多数德国人对纳粹的所作所为怀着强烈的忏悔意识相比,日本人的认罪态度很不诚恳。世代友好符合中日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但是,为了巩固中日两国人民的世代友好关系,与“治安维持法牺牲者国家赔偿要求同盟”等有良知的组织合作,向日本国内妨碍中日友好的反动潮流作斗争也是非常必要的。

(作者 米彦军,山西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徐志民)